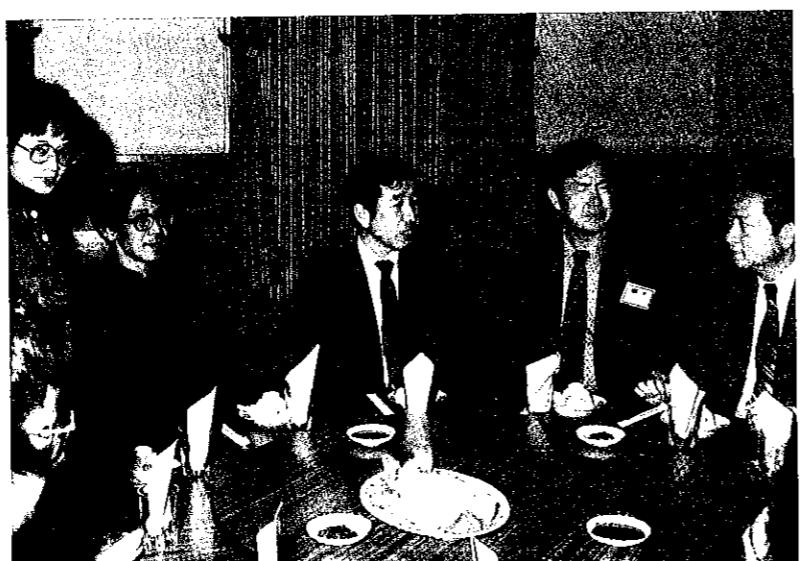


一九七七年，現已去世的台大內科醫師莊哲彥教授剛好在喬大做一年的研究員，喬大那時有一位名叫荷莉安席德 (Hollinshead) 的女教授在生化學科做研究工作，做得還蠻有名的，在免疫學界大致還算出名，而且同道，故莊教授就選擇她為指導教授。莊教授的經費來源是否是荷莉安席德提供的，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

有一天莊教授到我辦公室來閒聊，語中透露了一個消息。那時台大醫學院的院長是李鎮源教授，但他的任期將於一九七八年，即翌年屆滿，台大正準備交棒給新的院長，但新的院長在哪裡還是個問題。於是七年制的同學就組織了一個地下組織，這個組織的基本主張是下一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應該出自七年制的畢業生。組織的成員及指導教授皆指名道姓，都是我的朋友，但為了避免料想

不到的後遺症，故在此用以假名稱謂。

莊教授的意思是，我在喬大做得不錯，品格也好，聲望俱佳，故擬向地下組織推薦我為候選人，但這建議要徵得我的同意。對這建議，我說就由莊教授裁決，我沒有特殊意見。但我內人是不太同意我的看法的。



右二為莊哲彥教授。

台大醫學院院長

也歡迎我回去，而喬大方面則也可以有一年的休假，因此我做了一個決定回台大半年。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帶著我的行李，先到日本的九州大學作了一個日語的演講，然後就搭機飛往台北。抵達台北後，先到B教授處報到，第二天我就去見了A教授，A教授語多鼓勵，對當時醫學院現任的各教授則不客氣的批評很多。他表示，台大醫學院的裡裡外外都是由他背後操縱，而且他的意見有直通台大各屆校長的本領。我心想，那應該由他擔任台大下一任醫學院院長很適宜？不管如何，當天談了不少話，A教授以等他電話通知而結束談話，並表示由他帶我見台大校長最合適。

不料過了幾天，A教授還沒打電話來，倒是另有很大影響力的C教授夫婦邀我到其陽明山的別墅過週末。因為他夫婦語氣誠懇，我只好接受邀請。陽明山上的深處有一公園，當時公園內還有一咖啡廳，第二天是禮拜天，我與C教授夫婦在那咖啡廳喝咖啡時，只見C教授太太用肘關節提醒他把話題轉移。這一信號顯然馬上奏效，C教授正式打開了話匣子，他說台大醫學院將換新院長，他已經去刺探在紐約做事的某教授，結果這位教授婉拒了這個建議，並且反過來建議他來和我談談，今天來陽明山主要的話題就是這事，如果我不拒絕這個建議，他就準備帶我去見台大校長。

我並沒有當場決定我的去從，但我的未決態度對C教授來講等於是默認了這個建議；我也比較了C與A教授，認為在行政上由C教授安排我去見校長較為合理，所以也答應了由C教授安排。過了幾天，A教授不曉得從哪裡知道了C教授正在安排帶我去見閻校長，不知是生氣還是賭氣，他從此未曾跟我提過一句關於安排見校長的事。

倒是C教授來消息說已定好某月某日與校長見面，到了當天，他用他自己的車子陪我到羅斯福路的校本部去，在車中他再三叮嚀這次見面不要由我提起醫學院院長的事，只與校長談天氣等與院長職位無關緊要的事，十分鐘左右後我就先行退場，由他來繼續會話。我當然遵守他的建議，與校長寒暄之後，按照與C教授的約定，十分鐘左右後就告辭，到外面的車子裡等候他。頃刻間，C教授很高興地從二樓下來坐上他的車子，並告訴我一切都很順利。只是閻校長不認為院長人選需要到美國去找，所以需要一個順水推舟的作法。C教授建議我去請教陳奇祿先生，陳奇祿是台大的考古學家，而且是國民黨當時的秘書長。我約他在仁愛路當時的首都餐廳吃西餐，他的回答是像台大醫學院院長這個職位不會扯到黨部裡去，於是這條路就斷掉了。

—竹中校友的聲援—

不久，已屆陽曆的歲末，周宜旋同學不知從何處嗅到我可能當台大醫學院院長的傳言，他對我說這種事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非活動不可，於是想到的是周應龍。周應龍是竹中校友，當時也是蔣經國的秘書室主任，而蔣經國是行政院院長。我曾經有鑑於台灣交通很亂，曾對周應龍說過，如果我回台灣而無法找到醫學院院長的職位，就乾脆回來當交通大隊的隊長，整頓一下台灣的交通。周宜旋於一九七八年一月某日，在台北車站前的希爾頓飯店開了兩桌酒席，那天晚上出席的是支持周宜旋的竹中校友，以及包括辛志平、彭商育等遠道從新竹請來的竹中前老師與校長。

想想，那天晚上聚餐的目的誰都知道，每一個人也都知道他要講的台詞及扮演的角色，不知底細的只有周應龍！餐會開始，從天氣講起，再加上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然後由辛校長帶頭談起我的事情，最後辛校長向周應龍說：「應龍，你可以做一點事！」周應龍說：「我可以做什麼呢？頂多是請蔣先生引見黃崑巖。」這話正中周宜旋等人的下懷！辛校長就說這是不錯的計畫，於是那天周應龍就要我等著行政院打電話過來。這使得好幾天連廁所我都不敢去，守住電話不放，結果當

年一月三十一日行政院真的來了電話而成事。

—會見蔣經國—

我前後見了蔣經國兩次，第一次見他是成大校長夏漢民安排的，第一次見面是上文所提的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周應龍安排的一次。我到行政院見他前曾拜訪了三個人，分別為C教授、D教授及E教授；C教授說要整建台大醫學中心，D教授說要給予權力解散認為不適任的教職員，E教授則說請准台大醫學中心擴大編制。有鑑於台灣的公務員不容易解職，D教授的要求真的有情無慳。到了約定的時間，只見周應龍突然出現，告訴我什麼都安排好了，約見時間是十五分鐘。

我進去後只見蔣經國的桌上放了我的履歷表一份，話題繞著我的故鄉後龍轉，也提到後龍的西瓜，他還提到三軍總醫院及榮總等，但就是不談台大。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話題轉到台大醫學中心，把C教授的意見陳述，他又問：「台大那麼老嗎？」我說：「您每天都會去對面的黨部開

會，也去過台大醫院，您應目擊過台大多老邁才對！」

看一看鐘錶，已過了約半個鐘頭，超過預定的十五分鐘很多，但台大院長的事卻隻字未提就結束了這次會面。等我從蔣經國的辦公室出來時，周應龍又像幽靈般出現，讚許本來說十五分鐘結果談了三十分鐘，不錯！並說他會向教育部下一個條子。但台大院長的事，就從此杳無消息。

就如上文所說，一月二十一日我依約見了蔣經國，可是，二月時台大的魏炳炎附設醫院院長要向全體醫院同仁，包括學生講演關於回國這半年對母校的觀感。率直是我的本性，我認為一個人有什麼感覺就說什麼感覺，有什麼觀察就說什麼觀察。我準備了講稿，講稿到早上三點鐘才寫完。我給了當時擔任內科總住院醫師的陳耀昌醫師一份稿子，並畫以箭頭標示改換下一張幻燈片，免得我還要做出換下一張幻燈片的要求，目的在增強演講的戲劇效果。

結果來聽我演講的什麼人都有，連周宜璇、方友文等竹中的校友也來了，媒體人士當然也沒缺席，把偌大的台大醫院第七講堂擠得水洩不通，就連走道也有人坐。我演講的重點在一、健康的教授治校制度，這與李遠哲的教授治校有此差別；二、封建思想瀰漫整個醫院，應予糾正；三、

應傾聽基層醫師的心聲，以加強團結；四、加強學生的教育；五、糾正紅包的惡習。我留了大約二十分鐘時間與聽眾交流，印象最深的是院長說了一句：「黃教授講的都對，我也想做點事，但不知從何做起。」結果，一位較為年輕的老師站起來指著院長說：「不知如何改革就不要佔據這職位！」

那時報禁還沒解除，但媒體還是利用我的演講內容，有的大幅報導，有的還加以扭曲攻擊台大醫院，這種報導持續了約十天之久，對台大說來是空前的大事件。魏火曜先生當時為校本部的教務長，這消息從媒體、從魏先生那裡，遲早都會傳入台大校長的耳朵，因而我在他們的眼中成了一個異議分子，不是改革的原動力。

台大醫學院院長之事從此煙消雲散，內人惠美也堅決反對我回台大，認為我與以前的老師們相處會花去不少時間與精力。我當年三月一日回抵華府的家裡，前後陸續收到六十幾封的信，語多讚賞我回台大時掀起的教學熱潮與新知，其中最使我感動的是有人說：「您在台大的半年，像布拉格之春呢！」但我內人堅決反對我回台大與老一輩的教職員周旋，在她的眼中，到台大是註定會鎩羽而歸；她保證如果我再成熟一點，而台灣另有這一類機會的話就讓我去。我知道這是安慰話，但誰料到不出幾年後會有成大的新機會！

台大後來決定了接任院長的人選，他不是七年制畢業的台大校友，而是我們的老師——彭明聰教授。彭教授是彭明敏先生的家兄，而且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無疑是適當的院長人選。

—厄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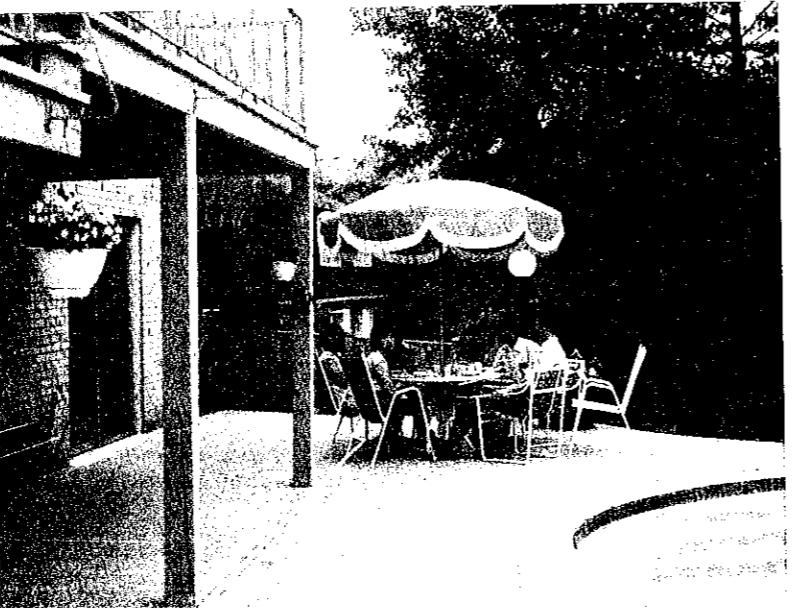
我既然經過一番生涯的驚濤駭浪，也該好好休息一下了。我想到我們於一九七四年搬到維吉尼亞州維也納的家後院蠻大的，可以容納一個游泳池，於是立即請了私有游泳池的設計建造專家來看，確定沒有問題後就動工挖了一個游泳池。這個游泳池帶給我們家人多少運動機會，實在難予估計，那一段時候，我們從未感覺過華府近郊夏天的天氣悶熱，因為下班一回家就把衣服脫掉換成泳衣泡在泳池裡，一家人就連吃晚餐都在池邊，絲毫感覺不到周圍悶熱的天氣。

很多外國的醫學院學生也常到我家裡度週末，其中上文提過的唐·卡龍就是其中之一。泳池到了冬天就把它蓋住，任冬天霜雪降下，荒涼它一季節，到了春天又把蓋子拿開就是。

當年年初內人惠美卻有了一個病徵，腸子裡面長了一個東西。住在華府近郊，很早即出國的女

院士兼科學家彭汪家康醫師，她的父親是一位風水師兼中國傳統的易經專家，根據他的說法，當時我們後院挖了一個洞蓄水當作游泳池，沒有選擇黃道吉日就開工，因而亂了命運的腳步。一九七九年的確是我們家的厄年。

不管如何，我和惠美講好，如果切片被診斷為惡性腫瘤，為了做更大的手術把直腸癌拿乾淨，會帶她到紐約的Sloan-Kettering 癌症中心，該中心有我的好朋友安士壯(Donald Armstrong)醫師，因為靠他的面識，我們取得了看醫師的預約。安醫師訓練了不少台灣的感染症專家，在不久後也當了



美國房子的院子與泳池。

美國的感染症醫學會會長，是一位頗為有名的醫師。就在他的指導之下，終於找到願意為惠美開刀的醫師，是姓關的華人。因為這是大刀，又出血不止，故同一天開了兩次刀才保存了一命。但內人惠美腸胃生理改變，苦了她的餘生。

就在惠美入Sloan-Kettering的時候，發生了白修德故事的餘波，已在前文陳述。

話說這期間我得來往華府與紐約之間，我在華府時，三個女兒的飲食都得由我下廚，凡是擀水餃皮、燒菜都得親自動手。但我不在華府時怎麼辦？那時喬大的生化學博士班有台灣來的留學生胡淑光同學，這位女同學長得優雅且舉止有大家閨秀之風度。我開口請胡淑光幫忙，她一口就答應。她是一位很負責的人，後來與一位名叫劉吉祥的年輕科學家結婚。

後來我在成大的某一天，胡淑光突然打了一通電話給我，那是從新竹的科學園區打來的電話。透過電話我才曉得她的夫婿劉先生已回台北工作，現在住在芎林，而芎林正是我們全家疏開時期的荒涼住所。最使我驚訝的是，她患了胃癌，經過外科手術及化療才從幽谷裡走回來的。這給我一陣打擊，似乎我內人惠美的不適移轉到她身上似地。

淑光也訪問過成大，我的秘書李美穎小姐也見過她，她給李小姐的印象也不錯，我和內人也去



胡淑光教授與其夫婿結婚照。

台大醫學院院長

203

過芎林她家拜訪過。她最後搬到上海去了，從上海曾來有音訊，料想她倆在那裡一定稱意，我只能遙祝她的健

康無恙。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202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一九八二年，即訪問大陸的翌年，我受邀回台灣創設了成大醫學中心，這段歷程因為另有回憶錄一本，故不再贅述。

但在成醫的創設期間，值得補提的是母親的辭世，時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在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開始運轉的三個月前。

—清華大學的機會—

一九九〇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通電話，是有關新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問題，電話是清華校

內校長遴選委員會的F教授特地打來的。校長的遴選要經過校內與教育部的遴選委員會遴選通過，這是現時的校長遴選常規。F教授在該委員會中的地位重要而特殊，他打這通電話是不尋常的，但在清華之前類似這樣要我寄履歷表競選校長的其他學校並不是沒有。

清華的F教授提出來的誘餌特別有吸引力，第一、清華的校長梅貽琦曾經是我內人在台大時的病人；第二、清華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可溯至民國前一年（西元一九一一年）的「清華學堂」，最初醞釀是在前清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間。我國駐美公使梁誠因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有「美國所收庚子賠款原屬過多」之語，一方面向美當局勸請核減，一方面上書清廷請以此款設學育才。中間雖因發生粵漢鐵路廢約之關係而生阻，但梁氏努力不懈，卒得美國國會之贊同，將處置賠款全權付與總統羅斯福。照條約我國應付美國賠款三千四百四十四萬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經總統決定將當時尚未付足之一千零七十八萬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從一九〇九年一月起退還我國。民國前三年（宣統元年，西元一九〇九年）為美國退還賠款之第一年，外務部與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商定學生遊美細則後，會同學部奏請設立「遊美學務處」及附設「肄業館」。六月初四日遊美學務處奉准設立，派外務部丞參周自齊為總辦，主事唐國安及學部郎中范源廉為會辦，

駐美公使館參贊容揆為駐美學生監督。初質北京東城侯位胡同民房一所為辦公處，後又遷入史家胡同，九月奏准將北京西直門外「清華園」作為遊美學務處興建「肄業館」館舍之用，是為清華得名之始。這一段歷史使清華有別的學校沒有的歷史羅曼史，且長久以來我對歷史就很感興趣，所以特別嚮往，再加上D教授的說服，使我特別心動。

於是我把這事提向內人惠美商量，尤其是美國國籍的問題，因為按照那時的法律，台灣的大學校長是不能有美國國籍的，連雙重國籍都不能有。經過深入的討論，如果需要放棄美國國籍，則我可以放棄，等以後這個規定取消，再申請恢復即可。美國國籍對我來說是需要的，這也是當時回台灣時，我口頭上對三個女兒的承諾。

該年春天校內遴選委員會通知找去與委員們見面談談，我依約赴會。該委員會成員包括李遠哲、張忠謀、現任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以及現在已經記不起來名字的幾位教授。我覺得當天的面談進行得還可以，因為事後站起來，李遠哲曾經走過來握我的手並說：「我應該早一點來和你談。」記得那天所談的多半是教育如何拓展的問題，接著由當時的沈君山校長等人說明清華的現況及將來的展望，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節目就是與同學們見面，在一個大階梯教室舉行，那間教室可

以容納三百人左右。這個會由同學主持，由同學發問，我記得他們關心的第一個問題是宿舍的安全問題。這個問題我也很關心，只是沈君山校長當時並沒有帶我去參觀學生宿舍，故無法確切地回答，我只說：「我是點子很多的人，而且你們的安全是我所關心的事，所以關於這一點等我到任後一定會有合理的解決。」

—打亂決定的法案—

但好事多磨就是指這類事吧，我從新竹回來後，有朋友急忙告訴我，美國的柯林頓總統投下了一個深水炸彈，使我們家庭會議的上述決定岌岌可危。原來，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凡是美國公民、且有年收入十萬美元，以及擁有五十萬美元財產的人，如果放棄美國國籍即認定為逃稅行為，一旦被認為是逃稅者，以後他放棄的國籍絕不能恢復，甚至連拿簽證踏上美國國土都不會核准。這是很大的一顆炸彈，而且來的真不是時候！我為了確認此事，還去函住在維吉尼亞州我老家附近的三哥蒐集一些資料，結果他立即傳真過來一篇《富比士》(Forbes) 雜誌刊登的柯林頓簽署法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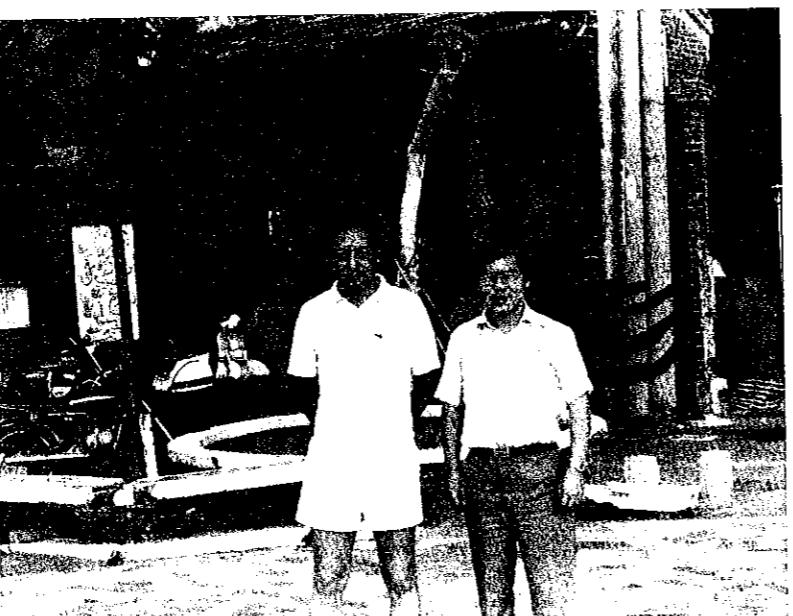
案的消息文章，該文的標題居然是刺眼的“*And Don't Come Back!*”（休想回來）。這是一顆真實的炸彈，這顆炸彈不得不使我對清華校長的職位重做一次徹底的三思，原因有三：其一、我一九八一年回台時對家人有口頭上不成文的允諾，等我退休之後必回美國，享受天倫之樂。其二、清華是名聞遐邇的高等學府，培育過諾貝爾得獎人的學校，萬不能有去不了美國的校長來領導它，這會產生不少校務之遲滯，在競爭激烈的國際高等教育上會對清華極為不利。其三、根據我守法的個性，前面兩個理由，即我國內對國立大學校長國籍問題的規定以及柯林頓簽署的法案，對我而言，皆是要人人遵守的鐵則。注重守法的我要是中選，非請清華或教育部想出個婉轉的辦法來迴避不可，休想正面及冒犯或做個假動作以掩蓋身分。

我因為這事請教了夏漢民校長，他的回應是：「法律歸法律，現實歸現實，你最好先放棄美國國籍，接受清華校長職位後再見機行事。」但我幾位好朋友卻持反對的態度，認為這事不能當開玩笑看待。我比較守法，只好另想辦法，但後來情勢的演變證明，前面一群人所說的與美國社會的現實主義相符。

話說遴選的下一步驟是教育部的委員會，我於該年初夏，依照通知時間到教育部面對教育部的

委員會。時間一到，我步入房間，見到的有田長霖、楊朝祥、羅銅壁、郭南宏、周昌弘、施振榮等面孔，委員共有七人左右，不是院士就是各界的名人，都是一流的人才，所談多半是大專教育該如何定義與定位的問題。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後，其中領軍的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表示時間已經談得差不多，委員會面談結束，全體委員就站起來要散會的模樣，我卻請他們又坐下，邊做手勢邊說：「你們沒有問我有關國籍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攸關我是否有資格承擔校長職位的最重要問題，不是嗎？」田長霖校長說：

「當然這是一個基本問題，非談不行。」我



筆者與楊憲桂教授合影。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說因為客觀情勢的變化，我必須再重新召開家庭會議好好地討論這事，委員中有人問我要多少時間，我立即回答二週。最後委員會給我二週的時間考慮而散場，時為八月初。

聽說清華校長的候選人一共有三位，第一可能的候選人因為另有原因而退出，故我與另一位候選人的可能性同樣地上升，這期間最熱心指導我的人算住在華府附近的楊憲桂博士。

那時常有教育部來的電話，包括羅銅壁教授及教育部人事室吳主任，而楊憲桂博士則要我利用這個他們要我接受清華職位的情勢做一點交涉，看教育部是否能仿照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的例子，也容許我在清華任教兼校長的可能性。我在教育部來第二通電話後寫了一封信建議教育部，但未獲接納。家人這時已經因柯林頓簽署的法案而對我放棄美國國籍問題已冷了半截，且群起表示不鼓勵，這也是預料中事。那兩週內我接到教育部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的電話兩通、教育部人事處的電話兩通，以及清華教授的三封信，顯然我已雀屏中選了。雖然我信奉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但我所建議的皆遭教育部婉拒而化歸泡影，最後只好放棄了清華的可能性，清華校長的事就這樣從我指間溜走。

吳處長三靈惠鑑

上週回承蒙惠電，謹及清華大學校長一事，本人深為感銘。
本人出生於新竹，居深地而細考之，脉，並在國內肄業（精學），極
知命主持清華，必會全力以赴，謹此保留。七月廿六日花都
方登而送之後，即以掛念心底，家中商討，決定屆時將放棄美國
國籍，致此共識，不料去年美國政府立新條款，禁止公民
如仍保有國籍之人之條件，特此暫時，因房價甚高，做字街後
動，增加大學本身之困難甚多，故對放棄美國國籍而有所考慮。
校長一職，請先保留為宜。

現況既無把握，故鄭重其事意本人，煩請研究是否可以
以清華生命科學院教授身任兼校長之方式解決，以免清華
校本人一併受害。如此為吾博雅圖書館降級之局面。

印件順況

（同時寄去印件，新舊有關消息之影印本）
二件

安祺

黃崑嚴

筆者最後與教育部人事處吳三靈處長的通信。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嚴自傳

一法律與現實——

我心裡是耿耿於懷的，明明到手的清華校長，白白地看它從指間溜走，豈不可惜。我於是寫了一封信給最小的女兒岫寧，為什麼選擇寫信給她，現已不記得原因。過了一週後，我收到一封小女兒的安慰信，信最後是這樣說的：「不要太傷心，因為台灣各界的人都知道你是很願意分享知識的。」

林其和醫師，現任的成大醫學院院長曾經跟我說，以醫學出身的身份而能被清華青睞，已經不容易了。委員周昌弘最近也談起這件事，認為以委員身分來說，他是很希望我能出掌清華的。已故的前吳京部長曾經也在教育部長下台後來我處興師問罪，但這要怪誰呢？

話說我現在住的公寓裡有不少美國在台協會的人，其中當然有在簽證部門或國籍部門供職的，我和其中一位在簽證部門供職的老外特別有點深交，最近有一天，他無意中向我透露，他們部門收到我們不少已下台的政府高官申請恢復美國國籍的申請書。他的這一句話，馬上在我腦際敲響了警鐘，我於是把清華大學校長遴選的故事始末簡要地告訴他，並且告訴他：「明天你上班後把

你們的法規專家請來問一下，一定問得出那篇“*And Don't Come Back*”裡寫的法案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要知道，因為我守法，其代價是一所知名大學的校長職位呢！」結果他的回答使我很訝異，他說：「崑巖，法律是法律，現實是現實。」我恍然這句話似乎曾經也出自國內的一些人口中。

與網球結下不解之緣

在竹中的時候，我和網球結下不解之緣，這個緣和我們家住在老新竹病院旁有關，新竹病院在二次大戰後改成省立新竹醫院。省立新竹醫院左端的放射線科面向我們的住所，放射線科的旁邊是一片草地，有一個網球場。這個球場，如果我們懶得繞道從正門進去，只要爬過醫院冗長的牆即可到達。那時新竹市內可以打有標準網球的球場不多，故所有住附近愛好網球的人都會在下班後聚集在這裡打網球。

那時台灣盛行的是日本人喜歡打的網球，叫軟式網球，不同於軟式的另一種叫硬式網球，現在風行全球的可以說都是硬式網球。軟式網球用的場地與現在的硬式網球完全一樣，規則也一樣，但不同的是以下幾點：一、球不同，硬式網球是有毛的，軟式的球則是光禿禿、要打空氣讓它膨脹

的球。因為球的性質不同，可塑性也特別大，故使球變形的伎倆也特別多，球彈跳的方式及程度也與硬式不同，是球藝的關鍵。二、規則雖然一樣，但計分喊法不同。現在風行的硬式網球是以十五、三十、四十的算法進行，但這是怎麼產生的，我全然不知。而軟式網球贏一球就算一，很是簡單。三、軟式比較注重雙打，而不注重單打；雙打時，打前面的永遠專注於打前面，後面就專司後面，前面的叫前衛，後面的則叫後衛。四、球拍的形狀稍異，硬式與軟式網球的各種裝備相比，前者較貴，故以那時台灣的經濟來說，沒人打得起硬式網球。

我三哥是什麼都會的人，連網球都是如此，看他每天爬牆在人群與場中馳騁，做弟弟的我好羨慕。那時家裡經濟狀況不好，不知怎的，他總是有辦法搞出一支屬於他個人的球拍，而我呢？我雖然在高二時成為竹中的校隊，在進入醫學院時也成了院的代表，但從未有過自己的球拍，都是臨時借人家的球拍打球的。

我在高二的時候就打入了竹中的校隊，記得成為竹中校隊時，家已搬到新竹女中對面的兩層樓房子。我擅長打前面的位置，叫做前衛，而且對前衛的角色掌握得很有分寸，和我搭檔的是竹中很強的後衛林建昌。我曾說那時在竹中，下午兩、三點鐘以後都在參加課外活動，在運動方面，我不

是在打籃球就是在打網球。竹中當時是台灣全島數得上的強隊，所以常常參加全省的比賽。

有一次全省的比賽在嘉義舉行，代表團到嘉義的前一天，因為之前我與班上同學往某地露營時染上了一場病，父親一定要我到離家只有幾間門面的醫院打「補針」。我得說明白，那時候很流行打針，所謂補針，當時指的是五十四西西葡萄糖而已，從現時的醫學來看，這補針一點意義都沒有。更糟糕的是，這醫院其實是一間獸醫院，是我同學傅偉勳的一位兄長開的。結果打完針不久，我就全身發燒、發抖，是中毒的現象，第二天起床後就全身疲累，走也走不動，遑論隨隊遠赴嘉義，結果我不得不請假脫隊而沒跟上竹中的校隊。

隊友們很是擔憂，前後來了急電找我，定要到嘉義歸隊參加比賽，弄得我不得不勉強啓程單刀赴會。但大勢已去，我到嘉義後也發揮不了作用，我們在初賽就敗在台中一中的手下。

以一個健康的人，找一位獸醫打針，是後來自己成爲醫生以後沒聽過的事。現在想起這事，對自己的無知覺得可笑至極。

到了台大醫學院，我的球藝還是程度頗高，但打完了院隊後，隨著課業的繁忙，也漸漸地不打球了。我之所以喜歡網球是它在球類運動中的地位，是與圍棋在棋界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不相上

下的緣由我猜想是網球不像籃球或是美式足球，僥倖與運氣、僅靠裁判來判斷的可能性很少。圍棋也不像橋牌一樣，黑白兩方的走法都擺在下棋雙方的眼前，看不看得懂，全看你的造詣。橋牌的確與獲得哪一種牌有關，但獲得哪種牌則完全看你的運氣。

但到了一九六三年負笈美國，事情有了重大的轉變，我買了自己的球拍，開始改打硬式網球，而且有了固定的美國人對手，他叫雅普（Yaap Boozman），是東歐移往美國的歸化公民，是一位預備役的美國海軍軍官。但他怎麼會出現，我們為何會搭檔的？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反正，天氣熱一點的春夏秋季節我們就



筆者與Mr. Yaap合影。

與網球結下不解之緣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